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04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述评

宁宝剑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经验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研究经验。前者建构的历史经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地位。后者建构的历史经验, 其有益的经验是, 西方文论有助于发现或深化中国诗学传统中受到忽略的或不受重视的维度; 其值得警惕的问题是, 研究中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中国传统诗学有成为西方文论脚注的危险。总结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 有利于建构更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神韵的文学理论。

关键词: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 中国传统诗学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31-10

引用格式: 宁宝剑.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述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31-40.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ed Overseas

NING Baojia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ducting oversea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two experiences we can learn. One is that in building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adhere to Marx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s. The other is that in conveying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oughts, on the one h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s helpful for us to find or deepen our thoughts of Chinese poe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be noted with the western centralism in case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becomes the footnot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hrough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n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verseas, this thesis will help to build the literary theory with mo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s and Chinese romantic charm.

Keywords: overseas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historical experience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ic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收稿日期: 2019-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宁宝剑(1982—), 男, 黑龙江佳木斯人,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

海外学者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中的优秀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其不合理之处也需要我们批判与反驳。在21世纪,面对海外学者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方面的成果,批判与反驳他们的一些错误观点,吸收与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借他山之石,雕刻自身,已刻不容缓。

海外学者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历史经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王斑。第二部分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建构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其建构的历史经验所在的领域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中国的抒情传统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刘若愚;建构中国叙事学传统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浦安迪;建构中国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华裔学者成中英、傅伟勋和中国台湾学者黄俊杰等人;建构中国抒情传统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陈世骧、高友工和王德威等人;倡导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和中国台湾学者陈鹏翔、古添洪等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的视域中,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

一 海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之历史经验研究

海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经验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法国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吸收与借鉴的经验;美国学界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其它国家学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

(一) 法国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吸收与借鉴

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思想,在法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毛泽东思想的矛盾学说和文化大革命思想,受到法国思想界领袖萨特和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欢迎,并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进展,介绍给当时的欧洲思想界。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萨特十分欣赏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与发展。其《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认为,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形势下产生的,若要真正理解它,必须重新审视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具有超越性,值得欧洲人思考和学习。^[1]

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中多次正面评价毛泽东思想。阿尔都塞的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早期著作》(*The Spectre of Hegel: Early Writing*)收录了其早期的学术论文。在这些论文中,阿尔都塞高度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改造,赞同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学说,认可其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建构,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推进。^[2]阿尔都塞在法国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Montesquieu.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中把毛泽东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列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此后,毛泽东思想的矛盾学说经常出现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的重要理论著作《读资本论》《保卫马克思》,亦存在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踪迹。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与传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最近也在探讨这一问题。这些学者以扎实和严谨的研究,基本厘清了毛泽东思想和阿尔都塞思想之间的事实联系,但后者如何在理论上接受前者,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不可否认,萨特和阿尔都塞接受毛泽东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许存在一些偏颇,但他们确实推进了毛泽东思想在西方思想界的接受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在法国的接受与传播,其中一些可以作为经验。从传播的角度讲,我们必须重视与西方思想家进行思想交流,让其认识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独特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大规模地宣传,很可能适得其反,容易引起对方的敌意等情绪;通过与对我们心存善意的他国思想家进行交流,让他们去传播我们建构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则很可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以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为例,毛泽东思想只是他研究的众多思想体系之一,但他仍然高度重视毛泽东思想。从前文对阿尔都塞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

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是阿尔都塞重视前者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经验：加强应对时代发展变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能力。

（二）美国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

自二战以来，美国是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镇。就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而言，美国学者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积累了一些可资参考的经验；这些学者主要是美国的海外汉学家和来自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

美国的海外学者除了现代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分析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外，其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由于站在现代理论变革的前沿，美国学者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熏染，他们的观点大胆犀利、引人深思。王德威认为美国研究马克思和毛泽东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王斑。王斑的代表作《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The Sublime of Figure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是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199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由7章组成，它的写作目的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上崇高形象的塑造和构成。根据作者的解释，这里所说的崇高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崇高，而是托马斯·韦斯科尔（Thomas Weiskel）所说的崇高，即崇高的最根本诉求，就是人能够在言语和情感上超越人性。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各种媒介手段致力于创作具有崇高品质的美学作品，是20世纪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一种重要现象。为了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王斑考察了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和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家的思想；思考其如何借鉴西方的崇高美学来构建中国式的政治崇高美学；解释这种崇高美学如何和政治交织在一起，为政治服务。同时，作者又以新潮小说家余华和残雪的作品为例，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所出现的“去美学化”话语，讨论为什么作家要消解“历史目的论、现实的唯物观念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崇高主体”^[4]。问题之一是，像其他海外研究者一样，王斑的研究是对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的美学理念进行研究，

并以比较文学的视野，深入阐释其研究对象的兴起、发展和演进。毋庸置疑，多年海外训练造就的开阔视野，使得他的一些观点比较新颖；但王斑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像其它海外成果一样，那就是，西方的理论，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西方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如何才能够内在地契合中国问题，他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这恰恰是我们以后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前国内进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些研究者虽然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但其思维、方法、术语都是西方的，这就导致其最终建构出来的成果仍然不过是西方理论观点的重复。问题之二是，由于作者论题涉及上百年时间，研究的对象众多，如何在众多对象中选择出具有典型性的例子，这是非常考验研究者的研究素养与能力的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一时段的研究进行充分的资料积累，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很可能有一定的主观性与任意性。因此，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应少谈一些不相关的概念与主义，多进行扎实的个案研究

香港大学的童庆生和北京大学的周小仪，2002年在英文刊物《边界2》（*Boundary 2*）上发表论文《批评与社会：中国现代批评主体的诞生》（*Criticism and societ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Critical Subject in China*）；随后，这篇文章在2005年又以汉语的形式发表在《开放时代》上，其标题被修改为《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兼谈“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可能性》。童庆生和周小仪在《开放时代》上发表的论文在时间上晚于《边界2》，其内容上几乎是英文版的复述，因此我们主要以英文版作为分析对象。在这篇英文写作的论文中，两位作者在开篇的第一个注释中向海外的读者和专家介绍了中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中国化文学理论的情况，并且列举了其在建构中国化文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具有中国化的文化话语，两位作者认为应该重新回到五四时期，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立的条件和方式。通过考察，他们发现中国传统诗话和词话产生于文人和士大夫之间，是士大夫阶层的私人话语；五四运动后，随着民众民族意识、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一种适应现代

公共空间的批评话语。受制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天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童庆生和周小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5],确实有其合理性,但其明显忽略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转型中的地位 and 影响。

《批评与社会:中国现代批评主体的诞生》是由国内学者在美国期刊发表的论文,其成功的经验是作者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问题。若要让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快速被欧美各国的读者与学者所接受,似乎只有按照欧美的学术话语模式进行理论操作才行,但如此一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究竟还有多少成色呢?用西方话语阐述中国文学理论,极为考验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创新能力,理想的情况是,讲述的方式是西方的,但内容是我们自己的,实现讲述方式与讲述内容的分离。

(三) 其它国家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

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夏志清的研究以利维斯和英美新批评研究理念作为研究指导思想,其忽视自1840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与夏志清不同,“布拉格汉学派”开创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ék)以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作为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他翻阅大量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材料后,认为鲁迅和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ík)受其老师普实克的影响,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论史上的建设性作用,其《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批评》(*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高度肯定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该书以时间为线索,探究茅盾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经历,分析他早期的哲学观,探讨他与文艺研究会的关系。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详细分析了茅盾的自然主义观念和现实主义观念、革命文学的问题和先锋文学的问题。高利克的茅盾研究在中国文学理论史的背景下展开探讨与分析,他

一直致力于建构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理论史,其研究弥补了以夏志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研究者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缺陷。高利克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茅盾和左翼作家的文艺思想进行的研究,对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因子,我们也要注意认真辨析。

高利克致力于建构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文论史,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1917—1930)》(*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1930*)和《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两本著作中。前者的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译者是陈圣生、华利荣、张林杰和丁信善;后者的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译者是伍晓明和张文定等。诚如作者所言,这两本书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的姊妹篇。《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1917—1930)》从标题即可以看出该书的两个特点:第一,作者探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产生的根源,Genesis一词意味着作者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产生的最根本的始基,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探讨不是在普通意义上描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相反,它是要探讨为什么此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可以被称为现代。在对发展的描述中,作者鲜明的问题意识贯穿研究的始终。第二,该研究把时间范围限定在1917—1930年之间,是因为作者确定产生于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最根本的组成元素,只有分析这一时间节点,才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根据作者的自述,他努力呈现出1917年中国文学革命“宣言书”的发表到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个时段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史^[6],换句话说,他想描述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史。《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根据英文直译应该是“中西文学对峙的里程碑(1898—1979)”,根据高利克的自述,“对峙”(confrontation)一词是来匈牙利比较文学家伊什特万·索特尔(István Söter)所建构的重要概念。高利克借用这个概念,

意在展现 1898—1979 年间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发生的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学的对抗情况。该书的第一章“梁启超和王国维：外国现代观念对中国文学界的第一次冲击”是补充《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1917—1930）》而写。在这一章中，高利克探讨了梁启超和王国维所开启的新文学观念，认为前者建立了新的小说观，后者确立了以外来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范式。此外，该书第四章“茅盾的《子夜》：与左拉、托尔斯泰、维特主义和北欧神话的创造性对抗”似乎与作者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某种承继关系。

高利克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经验如下：

（1）必须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转折点进行研究。高利克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展的关键节点的把握极为准确，以清末民初和 1917—1930 年作为研究的节点，察觉到了变革中国文学理论的真正力量。（2）西方理论、方法和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是必须要解决的矛盾。高利克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西方的“先进”方法，不少是纸老虎，必须让这些方法为研究对象与内容服务，这样，自然也就解决了方法与研究对象、内容之间的矛盾。

若要建构符合历史本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其重要环节是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构成中的外国元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苏联文学理论和欧美各国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外国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像中国学者一样，外国学者也进行了比较严谨的研究。根据高利克的归纳和总结，这方面有代表的成果一是澳大利亚的国际著名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的著作《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1919—1925）》（*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二是荷马著名汉学家 D. W. 佛克马（Douwe W. Fokkema）的著作《中国文学和苏联影响（1956—1960）》（*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该书 201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杜博妮的著作系统地梳理了 1919 到 1925 年间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佛克马的著作则是把研究的时间限制在 1956 到 1960 年间，梳理了中国文学理论对苏联文学理论的接受历史。两部著作以扎实的事实为基础，为

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特质，反思中国的现代文论传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 中国传统诗学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

中国传统诗学研究的新范式主要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中国传统诗学的建构以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为代表；微观上则是以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为代表。

（一）以西格中的典范：刘若愚之《中国的文学理论》

以西方的哲学或文学理论审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起，已经或明或暗，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身处海外的学者，有便利的条件了解西方的哲学、文化和文学理论，更有可能以西方之理论，审视中国固有之文学思想的研究模式，取得更为令人信服的成果。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就是这种研究模式的代表。

《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以西格中、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思维探讨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典范。刘若愚在 M.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文学批评四要素图式的基础上，把以作品为中心的单向循环系统，改造为具有开放属性的双向循环系统，并把“艺术家”改造为“作家”，“观众”改造为“读者”。刘若愚认为他改进过的图式“展示出了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构成了整个艺术过程的四个阶段”^[7]。根据他改进的图式，刘若愚把中国文学理论分为六种理论：形而上的理论、决定的理论、表现的理论、技巧的理论、审美的理论和实用的理论。他在考察相关中国文学理论的同时，他特别注意把其与西方可资比较的理论进行对照。最后一章，他又分析了六种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文学理论被他划分为六种理论，这种划分的方式借用的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可以说，刘若愚找到了一条便捷的中西诗学比较的路径。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是对中国旧有文学理论的再审视。从逻辑的角度讲，他把中国文学理论分为六种文学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其优点是按照西方的文学思维运作，其理论能较容

易地被西方学者理解与接受;其缺陷则是没有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自成体系的中国文学系统割裂成了一个片段。这是一种有缺陷的比较方法,但确实具有可操作性。其研究经验告诉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已经有意或无意地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思维或理论。一方面,我们无论是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或文学理论,还是用相反的方式,都需要警惕方法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对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何缩小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 中国叙事学

海外中国叙事学建构的历史经验的提供者,其代表人物是浦安迪、王靖宇、鲁晓鹏、朱利安·K.默里(Julia K. Murray)等。浦安迪是海外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其发现的中国叙事文的文学创作与历史著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开创性意义,成为以后域外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

海外中国学者王靖宇《早期的中国叙事:以<左传>为例》明确倡导建立中国叙事学:“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讨论也许服务于促进更系统地研究中国早期的叙事作品,最后演化出一种广义的中国叙事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并以此激活中国叙事传统与其它文学的叙事传统之间更有意义的比较。”^[8]也许这段话不仅是这一篇论文的研究理想,而且也是作者所从事的中国叙事文研究的终极理想;这一理想分布在其如下的著作中:《<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靖宇的论文《早期的中国叙事:以<左传>为例》,被收入海外中国叙事学的另一位著名研究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所编的文集《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浦安迪在中国叙事方面的研究的主要体现在如下著作中:《<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u*

ta chishu)、《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浦安迪主编的《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不但收录王靖宇等域外中国叙事研究名家的文章,而且也收录他自己带有总结性与反思性的文章《走向一种中国叙事学的批评理论》(*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经验是抓住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中国的历史著作与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这是浦安迪的研究为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诚然中国叙事学的建构需要一种他者的眼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国文学传统,立足于中国经史子集的分类传统,立足于经学主导的传统,这样才能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肖清在《北美中西比较叙事学理论的建构——以浦安迪的研究为缘起》对此有所解读,他认为王靖宇、倪豪士、鲁晓鹏都是在浦安迪所开启的“历史与小说”的研究路线下,继续从事中国叙事学研究的。^[9]卢晓鹏的《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梳理出中国特色叙事文学的一条主线,即从史实到虚构的发展脉络。朱利安·K.默里(Julia K. Murray)的《道德的镜子:中国叙事插图与儒家意识形态》(*Mirror of Morality: Chinese Narrative Illustration and Confucian Ideology*, 2007)就是站在大叙事的观念下,把插图纳入叙事学的考察范围,从中发现中国叙事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某种外化的线索。

(三) 中国的抒情传统

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但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学中的抒情问题,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抒情传统”呢?陈世骧(1912—1971年)在20世纪的70年代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抒情传统”的命题,随后其他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研究。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包括《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原始观念试论》和《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论著,它们被收集在《陈世骧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中。陈世骧认为西方文学传统是史诗—戏剧传统,而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抒情传统。“歌或曰言词乐章(word-music)所具备的形式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诗经》

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这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航道确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之后，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lyricism）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荣耀，也造就它的局限。”^[10]陈世襄用西方的抒情理论反观中国文学传统，看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源远流长，其功绩自不待言。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这种以西方理论审视中国文学的方式，自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起就存在。其次，他是以西方对抒情诗的定义理解中国的《诗经》《楚辞》传统，是否西方的抒情诗和中国对抒情的理解之间具有一致性呢？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第三，《诗经》多大程度上是自我的主观抒情，恐怕也需要具体考察。最后，虽然陈世襄补充西方也有“抒情传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他仍然没有很好地区别出中国抒情诗与西方抒情诗的不同之处，从而未能明确中国抒情传统的独特性。但不可否认，陈世襄所提出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确实具有很强启发性，因而引起其他学者的热烈讨论。

美国学者高友工分析中国小说和戏曲中的抒情问题时，以陈世襄的“抒情理论”作为参照，推进了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进展，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典与文学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两本著作中。另外，台湾学者蔡英俊、吕正惠、柯庆明、叶嘉莹、张淑香、萧驰等人也纷纷著文，深化了“抒情传统”的论述。在陈世襄和高友工等学者开启的“抒情传统”的基础上，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王德威教授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梳理出一条“抒情传统”的线索，他这方面的思考被收集在其《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一书中。

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的讨论蔚为大观，是当前中国文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反思与关注。虽然以西方的文学理论反观中国文学具有让中国文学成为西方理论脚注的危险，对此需要予以警惕，但另一

方面，如果在以西方的文学与理论审视中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坚持中国文学本位，那么这种思路或取向是值得称许的。

（四）中国解释学

受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提出的阐释学启发，中国著名学者汤一介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在美国，华裔学者成中英和傅伟勋对建立中国阐释学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前者主张建立“本体诠释学”，后者主张建立“创造的诠释学”。

成中英“所谓‘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就是使方法论与本体论融合，用方法来批评本体，同时也用本体来批评方法。这样，在方法与本体的相互批评中，真理就逐渐显露出来”^[11]。成中英关于“本体论诠释学”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哲学化色彩较重。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需要向其学习的有益经验是不能忽视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探索与实践。与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相比，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意味更强，更具有可操作性。“作为一个方法论的创造性的诠释学共分五个辩证的层次，不得随意越等跳级。这五个层次是：（1）‘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3）‘意蕴’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含是什么？’；（4）‘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5）‘必谓’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12]

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主张建立“经典诠释学”。“经典诠释学”是景海峰等中国学者对黄俊杰的孟子学诠释史研究进行归纳与总结的理论结晶。黄俊杰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主要体现他在中国台湾出版的二卷本《孟学思想史论》中，该书200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将其名字改为《中国孟学诠释史论》。根据黄俊杰在《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中的归纳，过去的孟子学研究有两种进路：“哲学、观念史的进路”与“历史/思想史研究进路。”“前者在研究方法

上将《孟子》视为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无关的哲学文献,并有意无意间假定孟子思想体系内各个观念或概念具有某种自主性,在这个假设上解剖孟子学中的重要概念。后者则将孟子及其思想放在历史与文化史脉络中加以考虑,尤其注意分析孟子学在思想史中之浮沉变化。”^[13]黄俊杰认为儒家诠释学的经世致用的取向最为显著,其中以下三个面相最为突出:“其一,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许多注经者透过注经以表述企慕圣贤境界的心路历程……;其二,作为政治学的儒家诠释学:由于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君主为主体,而儒家政治理想是以人民为主体,儒家之价值理想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实践,于是,许多儒家学者在有志难申之余,以经典注疏之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其三,作为护教学的儒家诠释学:历代儒者以经典注疏作为武器,批驳佛、老而为儒学辩护者代不乏人。”^{[13][413]}如果说上述关于孟子学研究的两种进路与儒家解释的三个面相之论,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那么黄俊杰关于探索孟子学诠释者三个层面的思想,似乎有被人忽视之嫌。他受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约翰·R. 塞尔(John R. Searle)把言语行为划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与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的启发,把孟子学诠释者的意旨分为三个层次

(1)言内之意:这是历代的孟子学注释者写作时所企图传达的意旨。

(2)言外之外:这是指孟子学诠释者在注孟、释孟或非孟时所透露的弦外之音。

(3)言后之意:这是指孟子学诠释者希望他们的诠释对读者所引发的效果。^{[13]6}

黄俊杰梳理孟学,在其中发现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哲学、观念史的进路与历史/思想史的进路。探讨儒家解释学的三个面向,分析孟子学诠释者的言内之意、言外之意、言后之意,这都是他对中国儒家诠释学实践的理论总结。显然,这些总结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五)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中具有争议的问题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裔学者李达三提出,还

是由中国台湾学者陈鹏翔、古添洪提出的呢?对此本文不予讨论,而是按照成果发表的时间之顺序对其理论进行评析。

陈鹏翔所谓建立中国比较学派的理论其实就是他比较文学概念的界定,所谓的步骤是在其理论的指导下如何达到目的地。1976年,台湾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古添洪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序言中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14]据陈鹏翔在《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步骤》一文中解释,这个定义是他改动过的。在这篇论文中,陈鹏翔升级了过去他们所主张的比较文学定义,认为“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跟中国的(甚至东方的)理论与方法做对比研究,以推衍出现今所谓的文学共同规律和法则(common poetics或universals),这是现今比较诗学的重心所在”^[15]。陈鹏翔根据自己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主张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可能要经过三个步骤:“(一)模仿和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二)考验、调整、修正以及扩大西方的术语、理论模子(model);(三)发掘新的文学理论模子,找出文学创作的一般法则和共同规律(universal或common poetics)。”^{[15]154}

台湾另一著名学者古添洪在1997年于《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三辑上发表论文《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界的当前走向》,对他与陈鹏翔所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概念有所阐发。在他看来,他与陈鹏翔所倡导的阐发研究将在理论的时代中继续发展下去。“无论毁誉如何,‘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以‘阐发’中国文学的研究途径将继续下去,换言之,比较文学‘中国派’将继续随着这条途径发展下去。当代‘比较文学’最大的特色是为当代文学理论所洗礼,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视野与走向,而台湾的中西比较文学的这方面可以说是与世界同步。”^[16]

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1977年在《中外文学》上发表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正式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主张。正如他所讲,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是一种宣言,而不是说中国学派已经存在。“事实上,中国学派迄今仍在建立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规模。本文与其说是一

份由经验凝成，经历史验证的完整宣言，毋宁说是一种揭示目标与方针，属于意识形态的临时声明。”^[17]

虽然港台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的主张，是一种策略性的宣言，但其毕竟让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存在，以及进行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推动下，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港澳台地区，还是欧美国家，中西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构想十分大胆，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理论探索精神是过去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之成绩及缺陷

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成绩值得肯定，缺陷也需要正视。

（一）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成绩

海外学者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研究领域：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二是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的建构与阐释。

第一个领域的研究经验，首先是个案研究与文学理论发展史相结合。其研究用扎实和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在个案研究与文学理论发展史的整理研究的结合中，呈现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历程，试图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最丰硕的成果。其次是坚持跨学科对话。其研究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中心，在与现代性理论、后现代性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它最新理论的对话中，分析研究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过程中杰出理论家的理论成果，充分肯定他们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和价值。最后是中国学者应该训练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让自己参与到国际学术舞台的对话中去。

第二个领域的研究经验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中国的抒情传统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之研究以域外观念反观中国的叙述思想、阐释理念、抒情观念和比较思维，

梳理它们在中国传统中的历史变迁，比较这些概念在中西传统中的差异，总结这些概念的中国特色，概括中国固有概念的一般规律。其研究激活了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深化了我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和认识，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路径，搭起了中西文学比较的桥梁，增进了中西文学思想的理解和交流。

（二）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缺陷

当然，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地方。

首先，海外学者虽然对西方文学理论有深刻了解，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的材料占有得不够全面，其研究往往以偏概全，未能做到史论结合。其次，他们的研究通常把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置身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本质和贡献，其不良后果是让后者成为前者的传声筒，后者未能彰显应有的特征、地位和历史意义。再次，海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往往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当下境遇，服务于作者本国的需要，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经常成为反观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这势必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中国意义和价值有所忽略。

海外学者在中国文论传统、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中国的抒情传统和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研究领域中的缺失如下：第一，非华裔的外国学者的汉语能力，尤其是古代汉语能力多少有些缺陷，因此其往往是根据翻译资料进行研究，这导致其研究成果缺少坚实的材料基础。第二，西方理论模子和中国材料的结合存在问题。在其研究中，中国材料如脚，西方的观点如刀，每每当中国材料不符合西方观念时，其研究就容易犯削足适履的毛病，这导致中国叙事学、中国阐释学和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中中国特色不足。第三，研究缺少更多的比较视域，即海外学者研究的比较视域通常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希伯来文学传统、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中国文学传统，对人类文明的其它文学传统往往视而不见。总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海外研究者的理论提炼能力有待加强。

由于历史、话语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并不是海外学者文论研究的主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研究带有建构或梳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学者,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学者居多。王斑是留学美国,尔后进入美国学术体制的中国人;童庆生和周小仪则是本土学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就中国人学人接受来讲,当前许多中国学者欣赏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等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不大欣赏“布拉格汉学学派”的研究成果。普实克和高利克的著作目前已经有了中译本,但他们受到的关注还很有限。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普实克和高利克等布拉格派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主角。我们不否认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等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不同面相,但是布拉格派汉学家的学术成果一直受到压抑和忽视,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海外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研究中存在的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 [1] SARTRE J P.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M]. John Matthews, translat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58-59.
- [2] ALTHUSSER L. The Spectre of Hegel: Early Writings[M]. G. M. Goshgarian, Translat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7: 247, 249, 253.
- [3] WEISKEL T. The Romantic Sublime: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 [4] 王斑. 历史的崇高形象: 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M]. 孟祥春,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15.
- [5] 童庆生, 周小仪. 文学类别的历史性和中国现代文论产生的条件: 兼谈“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可能性[J]. 开放时代, 2005(6): 74.
- [6] 玛利安·高利克.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M]. 陈胜生, 华利荣, 张林杰,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2.
- [7] 刘若愚. 中国的文学理论[M]. 田守超, 饶暑光,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16.
- [8] WAN J C Y.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n as Example[M]//Andrew H. Plaks.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4.
- [9] 肖清. 北美中西比较叙事学理论的建构: 以浦安迪的研究为缘起[J]. 汉风, 2016(0): 112.
- [10] 陈世襄. 论中国的抒情传统: 1971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致辞[C]//陈国球, 王德威.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47.
- [11] 成中英. 方法概念与本体诠释学: 一个方法论的新建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6): 25.
- [12] 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J]. 时代与思潮, 1990(2): 240.
- [13] 黄俊杰. 中国孟学诠释史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8.
- [14] 古添洪, 陈慧桦. 序[C]//古添洪, 陈慧桦. 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 台北: 东大图书发行公司, 1976: 2.
- [15] 陈鹏翔. 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步骤[C]//黄维樑, 曹顺庆.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 台湾学者论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1.
- [16] 古添洪. 中国学派与台湾比较文学界的当前走向[C]//黄维樑, 曹顺庆.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 台湾学者论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74-175.
- [17] 李达三.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C]//李达三, 罗钢.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4.

责任编辑: 黄声波